



doi:10.11835/j.issn.1008-5831.2016.05.002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王庆华,王瑞君. 地方政府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10-20.

Citation Format: WANG Qinghua, WANG Ruijun.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FDI and welfar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5):10-20.

# 地方政府竞争、外商直接投资 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王庆华<sup>1</sup>, 王瑞君<sup>2</sup>

(1.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2. 南京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引资竞争背景下, FDI在城乡间的不均衡分布对辖区居民经济福利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 从市辖区和市辖县两个方面对地方政府引资竞争背景下 FDI与城乡居民经济福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 在市辖区, FDI进入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 优惠政策对其也具有间接的积极作用; 在市辖县, FDI并未明显提高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 优惠政策也未对其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 在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发展理念下, 县区居民分摊了市区经济的发展成本, 从而弱化了其福利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引资竞争; FDI; 居民福利; 地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6)05-0010-11

##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 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进入, 它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同时也有力地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2013年, 中国实际利用 FDI 金额达到 1 240 亿美元, 与 1994 年 338 亿美元相比, 增长了 2.67 倍; 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8 311 元, 与 1994 年的 2 709 元相比, 增长了 5.76 倍。但与此同时, 中国整体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 FDI 区域分布和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发展倾向。一方面, 进入中国的 FDI 大部分集中在城市, 而流向农村的外资金额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二者的差距不断拉大。2013 年,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26 955 元和 8 896 元, 前者是后者的 3.03 倍, 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有的医疗、教育、保险等福利项目, 二者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 因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均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对 FDI 在城乡间的不均衡分布以及日趋恶化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人们不禁会问: FDI 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具有怎样的影响, 它是否加剧了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进而恶化了二者的福利水平?

针对 FDI 流入对东道国居民福利的影响, 学界从多层次、多角度进行了研究。在国外, Blomstrom、Lipsey 和 Zejan<sup>[1]</sup> 研究发现, FDI 对东道国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 能够促进东道国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增加就业和政府财政收入, 从而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 FDI 对东道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具有正向影响。持相

修回日期: 2016-06-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金融: 发展、风险与监管”(14ZDA043); 陕西省博士后科研项目“结构分解视角下的股票市场波动性研究”(2015086)

**作者简介:** 王庆华(1978-), 男, 陕西西安人,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产业投融资研究, E-mail: songyihong225@163.com; 王瑞君(1984-), 男, 山西吕梁人, 南京大学—陕西投联合培养博士后, 主要从事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与投资研究。

同观点的还有 Borensztein、Gregorio 和 Lee<sup>[2]</sup>,他们认为,FDI 作为母国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因素的“复合产品”,它们进入东道国后将明显提高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对东道国社会经济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与前面学者观点不同,Reis<sup>[3]</sup>认为,由于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高于本土企业,它们研发新产品的成本远低于内资企业,进入东道后,外资企业将会利用自身优势对内资企业进行挤占,进而产生外资商品对内资商品的“市场攫取效应”(Market Stealing Effect),形成外资企业在市场上的“寡占”,内资企业利润转移到外资企业,但由于外资企业利润不参与东道国分配,从而减少了东道国的福利水平。对于这一观点,Markusen 和 Maskus<sup>[4]</sup>却认为,虽然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存在竞争实力上的不对等,后者的竞争效应会对前者发展产生较大压力,但外资企业带来的关联效应和示范效应也会对内资企业产生积极影响,内资企业能够从模仿和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实力,二者间的差距将会不断缩小。这时,内资企业利用本土优势可能对外资企业进行挤占,产生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挤出效应。在其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Moran 和 Theodore<sup>[5]</sup>对 FDI 与东道国福利水平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不同性质的 FDI 对东道国的社会福利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东道国引入的 FDI 是“数量型”而不是“质量型”,那么 FDI 进入并不必然增加东道国的社会福利,反而可能出现“贫困化增长”。对此,Sarbajit 和 Dibyendu<sup>[6]</sup>通过研究也发现,“质量型”FDI 进入东道国农业领域后,能够显著提高该国的综合福利,同时还能够提高东道国的综合就业率。

在国内,潘文卿<sup>[7]</sup>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挤占东道国市场,对国内企业产生了严重冲击,对市场秩序的平稳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同时,外资企业越来越强的市场控制力明显降低了东道国的整体社会性福利。于津平<sup>[8]</sup>研究得出,FDI 对东道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其外溢效应的程度,如果 FDI 的溢出程度能够显著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那么 FDI 将提高东道国的福利水平;如果 FDI 凭借自身优势及政府政策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替代效应,那么它将恶化东道国的福利水平。与此同时,应千伟和杨全发<sup>[9]</sup>从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等角度分析了引入 FDI 将对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发现在整体上 FDI 对流入地的社会福利水平是不确定的。周泳宏<sup>[10]</sup>通过建立两部门模型的 Ramsey 分析框架,分析了 FDI 进入带来的漏损,发现通过提高 FDI 的外溢弹性能够促进国民福利水平的提升。持同一观点的还有张广胜和周娟<sup>[11]</sup>、颜冬<sup>[12]</sup>等,他们认为积极的引资政策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其他研究不同,阚大学<sup>[13]</sup>运用面板数据,通过分地区考察了 FDI 进入后对当地居民收入分配等经济福利的影响,发现 FDI 会增加东部地区居民的经济福利,但中西部地区居民的经济福利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郑少华和罗丽英<sup>[14]</sup>研究指出,FDI 虽然增加了政府税收和就业人口,但同时也对市场结构与秩序构成了潜在的不利影响。因而 FDI 对中国的福利效应是多维性的,不能从单一的指标上进行判断。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对此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还存在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其一,国内外文献就 FDI 对东道国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并且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国家层面上的宏观分析,而以城乡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还较为少见;其二,中国城乡经济存在明显的“二元”特征,对于其影响因素,现有文献从 FDI 在城乡间不均衡分布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还较少见。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 210 个地市及以上城市 1994-2013 年面板数据,立足于地方政府间激励的引资竞争背景和“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发展理念,将全样本分为市辖区和市辖县两个部分,从而分析 FDI 进入后对中国城乡居民经济福利产生的影响及差异。希冀所得结论能够对相关部门的引资和用资行为提供参考,以及为各级政府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启示。

## 二、理论分析

FDI 作为母国资本、技术、制度、管理经验等要素的“复合体”,进入东道国后,它将参与东道国的经济活动,进而其内含的多种要素将通过溢出效应对东道国社会经济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借鉴魏后凯<sup>[15]</sup>的做法,利用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探讨地方政府引资竞争背景下 FDI 对城乡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

首先,FDI 进入中国后,城乡两个地区具有如下生产函数形式:

$$Y_i = A_i L_i^\alpha FDI_i^\beta \quad (1)$$

式(1)中, $Y$ 表示由外商直接投资等要素带来的产出, $A$ 、 $L$ 、 $FDI$ 分别表示中国城乡的技术水平、劳动力投入量以及作为资本要素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城乡两个地区的投资额, $i = 1, 2$ 表示城市与农村两个地区。

接下来,我们分别对城乡生产函数两边除以各自的劳动力投入量,得到人均产出方程:

$$y_1 = Y_1/L_1 = A_1 L_1^{\alpha-1} FDI_1^\beta \quad (2)$$

$$y_2 = Y_2/L_2 = A_2 L_2^{\alpha-1} FDI_2^\beta \quad (3)$$

式(2)和式(3)中,  $y_1$ 、 $y_2$  分别表示城乡两个地区的人均产出。

然后,对式(2)和式(3)两边取自然对数并求微分,得到城乡两个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表达式:

$$\Delta y_1/y_1 = \Delta A_1/A_1 + (\alpha - 1) * (\Delta L_1/L_1) + \beta * (\Delta FDI_1/FDI_1) \quad (4)$$

$$\Delta y_2/y_2 = \Delta A_2/A_2 + (\alpha - 1) * (\Delta L_2/L_2) + \beta * (\Delta FDI_2/FDI_2) \quad (5)$$

式(4)和式(5)中,  $\Delta y_i/y_i$ 、 $\Delta A_i/A_i$ 、 $\Delta L_i/L_i$ 、 $\Delta FDI_i/FDI_i$  分别表示人均产出增长率、技术进步程度、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

最后,我们假定 FDI 进入城乡两个地区后,城市的技术水平、劳动力投入量及外资投入额的变化幅度大于农村地区的变化幅度。即有:  $\Delta A_1/A_1 > \Delta A_2/A_2$ ,  $\Delta L_1/L_1 > \Delta L_2/L_2$ ,  $\Delta FDI_1/FDI_1 > \Delta FDI_2/FDI_2$ 。在此假定下,我们利用式(4)和式(5)可以得到:

$$\Delta y_1/y_1 > \Delta y_2/y_2 \quad (6)$$

从式(6)可以发现,上述假定下,FDI 进入城市和农村两个地区后,城市人均产出增长率大于农村人均产出增长率。实际上,该结论与中国的现实较为一致,FDI 进入中国后,它无论在地区分布上,还是在行业分布上,都表现出十分显著的城市“扎堆”现象。1994-2013年,中国地市及以上城市当年实际利用 FDI 金额从 404 亿美元增长到 2 480 亿美元,增长了 5.14 倍,年均增长率为 25.69%。其中,市辖区实际利用 FDI 金额从 321 亿美元增加到 1 750 亿美元,增长了 4.45 倍,年均增长率为 22.25%;市辖县实际利用金额从 83 亿美元增长 730 亿美元,增长了 7.80 倍,年均增长率为 38.9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市辖县实际利用 FDI 的增长幅度大于市辖区的增长幅度,但超过 70% 的金额都投入到城市经济活动中。同时,即使 FDI 进入市辖县后,其中相当一部分也进入县区城市的经济活动中,而真正流入农村的 FDI 数额会更少。这也可以从 FDI 在行业经济中的分布进行印证,1994-2013年,工业实际利用 FDI 金额占当年行业实际利用 FDI 总金额的比值超过 60%,最高时期接近 80%,而进入农业的 FDI 长期处于 1%~3% 之间,而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伴随性”特征,从而表现出 FDI 在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布上的巨大差异。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 FDI 在城市的“扎堆”? 我们认为,“经济分权”和“政治晋升”的制度安排是解释这一现象的重要视角。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分权改革以来,后者对辖区经济的决策和管理权限得到了明显提升。通过发展经济,地方政府可以与中央政府共享财政收入,同时,中央政府通过“政治晋升”对政绩优异的地方官员进行“奖励”。在此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行为表现出明显的表面化、短期化特征,与农村相比,发展城市经济更能增加政绩权重,于是政府之手对资源的流动进行了不合理干预,大量优质资源向城市集聚。其中之一,就是政府之手干预下 FDI 在城乡的不均衡分布,这正如陶然、刘明兴<sup>[16]</sup>的研究结论,他们认为,在“唯经济增长是重”的执政理念下,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优先发展城市经济的政策偏好,资源要素向城市倾斜。因此,“重城镇、轻农村”的政策偏好是加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作出如下判断:FDI 在城乡之间的不合理分布是导致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重要原因,而导致 FDI 在城乡之间的分布现状与地方政府面临的制度安排具有密切联系。

### 三、研究设计

#### (一) 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 Changkyu Choi<sup>[17]</sup>,魏后凯<sup>[15]</sup>的研究方法,建立如下动态计量模型。

$$WI_{it} = \alpha + \beta_1 WI_{it-1} + \beta_2 FDI_{it} + \beta_3 POLI_{it} + \beta_4 (FDI \times POLI)_{it} + \sum_{m=1}^n \lambda_m CONT_{it}^m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7)$$

式(7)中,  $WI$  表示居民经济福利,  $FDI$  表示外商直接投资,  $POLI$  表示地方政府给予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CONT$  代表控制变量,  $\alpha$  为模型的常数项,  $\beta_j$  ( $j = 1, 2, 3, 4$ ) 为因变量滞后一期及主要解释变量系数,  $\lambda_m$  为控制变量系数,  $\mu$  是城市不能观测的个体效应,  $\varepsilon$  为方程的残差项,模型中的  $i$  代表城市,  $t$  代表时间。

#### (二) 变量度量及数据说明

##### 1. 因变量

对于居民经济福利( $WI$ ),采用 Sen<sup>[18]</sup>提出的福利指数表示,其表达式为:  $WI_{it} = \bar{y}_{it}(1 - gini_{it})$ 。在该式

中,  $y$  代表人均可支配收入,  $gini$  代表基尼系数。由于统计指标中缺乏直接的  $gini$  数据, 我们借鉴莫亚琳和张志超<sup>[19]</sup>的方法, 先测算出本文考察样本的基尼系数 ( $gini$ ), 然后利用前式得到居民经济福利指数  $WI$ 。

## 2. 自变量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 ( $FDI$ ), 先将进入各城市的  $FDI$  按照市辖区、市辖县进行划分, 然后借鉴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 (UNCTAD<sup>[20]</sup>) 的方法, 分别计算历年各城市市辖区 (市辖县)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各城市市辖区 (市辖县) 实际 GDP 的比值, 历年全国城市市辖区 (市辖县)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全国市辖区 (市辖县) 实际 GDP 的比值, 然后用前一比值除以后一比值的值进行度量; 对于优惠政策 ( $POLI$ ), 地方政府为了在引资竞争中获胜, 竞相通过税收减免、土地无偿使用、产权转让等方式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 同时, 为了强化政府对进入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服务, 地方政府常对其进行集中安置, 即通过在本辖区设立开发区、免税区、自贸区等来提高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 从而促进了外资企业在辖区的集中分布, 因此, 不同层次的港区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对外资企业实施优惠政策的集中体现。基于此, 我们借鉴 Démurger 等<sup>[21]</sup>的做法<sup>①</sup>, 先按城市对不同类别的开发区赋值, 并对所赋值累加得到各个城市总的优惠政策指数, 然后计算各城市市辖区 (市辖县) 财政支出占当年城市财政总支出的比值, 最后利用二者的乘数来度量优惠政策这一指标。除此之外, 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优惠政策相互作用后对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 将二者的交互项 ( $FDI \times POLI$ ) 引入模型。

## 3. 控制变量

由于影响居民经济福利的因素难以穷尽, 我们借鉴陈刚<sup>[22]</sup>、赵奇伟<sup>[23]</sup>等人的做法, 并结合本文的研究重点, 分别选取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居民的教育水平作为模型中控制变量。对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 $DELE$ ), 用各个城市市辖区 (市辖县) 人均  $GDP$  来度量; 对于对外开放程度 ( $OPEN$ ), 用各城市市辖区 (市辖县) 历年对外贸易出口额占该市出口总额的比值度量; 对于居民教育水平 ( $EDUC$ ), 先利用公式: 小学教育人数 $\times 6$ +初中教育人数 $\times 9$ +高中教育人数 $\times 12$ +大专以上教育人数 $\times 16$  得到各城市市辖区 (市辖县) 居民总的教育水平, 然后用该值分别除以城市市辖区 (市辖县) 总人口数得到所需要数据, 公式中的 6、9、12、16 分别表示达到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年限。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名称	符号	单位	定义
居民经济福利	$\ln(WI)$	元	计算公式 $WI = y(1 - gini)$ 计算并取对数
外商直接投资	$\ln(FDI)$	万元	利用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 (UNCTAD, 2012) 的方法计算
政府优惠政策	$POLI$	—	借鉴 Démurger et al. (2002) 的方法并进一步处理得到
经济发展水平	$\ln(DELE)$	亿元	各市辖区 (市辖县) 的人均 $GDP$ 取对数
对外开放水平	$OPEN$	—	各市辖区 (市辖县) 历年对外贸易出口额占所在城市外贸出口总额的比值
居民教育水平	$EDUC$	年/人	(小学教育人数 $\times 6$ +初中教育人数 $\times 9$ +高中教育人数 $\times 12$ +大专以上教育人数 $\times 16$ )/市辖区 (市辖县) 人口数

本文全样本包括中国 210 个地市级以上城市 1994–2013 年数据, 若不作特别说明, 所有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整理获得, 对于以美元计量的变量, 利用历年美元对人民币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计算, 对于以货币计算的变量, 我们利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进行平减, 基期是 1994 年, 个别数据缺失, 利用插值法补齐。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 2。

①本文对各类开发区的赋值如下: 1 代表沿江及内陆开放城市; 2 代表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或沿海开发区; 3 代表沿海开放城市; 4 代表六个国家级新区, 即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甘肃兰州新区、广东南沙新区; 5 代表经济特区。

表2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居民经济福利 ( $\ln(WI)$ )	市辖区:49.581 市辖县:23.023	市辖区:6.385 市辖县:7.604	市辖区:31.793 市辖县:17.732	市辖区:127.047 市辖县:67.048
外商直接投资 ( $\ln(FDI)$ )	市辖区:13.247 市辖县:8.455	市辖区:15.820 市辖县:11.681	市辖区:0.000 市辖县:0.000	市辖区:2207.538 市辖县:625.874
政府优惠政策 ( $POLI$ )	市辖区:3.328 市辖县:1.142	市辖区:0.415 市辖县:0.618	市辖区:0.853 市辖县:0.072	市辖区:5.109 市辖县:2.417
经济发展水平 ( $\ln(DELE)$ )	市辖区:12.106 市辖县:4.082	市辖区:3.144 市辖县:2.918	市辖区:3.213 市辖县:1.694	市辖区:88.501 市辖县:49.815
对外开放水平 ( $OPEN$ )	市辖区:0.286 市辖县:0.092	市辖区:0.894 市辖县:0.515	市辖区:0.073 市辖县:0.014	市辖区:0.343 市辖县:0.110
居民教育水平 ( $EDUC$ )	市辖区:9.031 市辖县:8.264	市辖区:2.332 市辖县:2.689	市辖区:6.506 市辖县:5.912	市辖区:13.691 市辖县:11.024

#### 四、实证分析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必须选择合适的估计方法。在本文的计量模型中,由于因变量存在前后期的相关性,而且解释变量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将导致结果的有偏及不一致。基于此考虑,我们选择使用广义矩方法(GMM)进行估计。该方法包括两种:差分GMM和系统GMM。前者可以有效克服计量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及残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然而,差分GMM估计过程中使用的弱工具变量也可能导致估计出现偏误。为解决上述问题,有人在差分GMM的基础上,将因变量的一阶差分的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从而得到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 GMM)。实验表明,对于有限样本,系统GMM比差分GMM的估计结果更有效,偏差更小。因此,我们综合考虑本文计量模型的经济意义以及面板数据的特征,最后选择系统GMM进行估计。

在估计的过程中,我们先将210个地市级以上城市分作市辖区和市辖县两个子样本进行检验;然后按照一定标准将二者进一步细分为八个地区<sup>②</sup>,以检验二者在地区间的差异。在检验之前,我们先对计量方程中主要变量进行均值差异的 $T$ 检验,从而在直观上反映各变量在市辖区与市辖县间的区别。从表3的检验结果看,主要变量中,绝大多数变量都表现出显著性,市辖区的均值高于市辖县,从而表明两组数据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表3 样本均值差异的 $t$ 检验

变量名称(符号)	市辖区均值	市辖县均值	$t$ 值	$p$ 值
居民经济福利 ( $\ln(WI)$ )	49.581	23.023	7.608	0.005***
外商直接投资 ( $\ln(FDI)$ )	13.247	8.455	-5.216	0.008***
政府优惠政策 ( $POLI$ )	3.328	1.142	-3.686	0.032
经济发展水平 ( $\ln(DELE)$ )	12.106	4.082	9.017	0.002***
对外开放水平 ( $OPEN$ )	0.286	0.092	1.034	0.190
居民教育水平 ( $EDUC$ )	9.031	8.264	4.089	0.074*

注: \*、\*\*、\*\*\* 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水平上的显著性。

<sup>②</sup>实证检验中,为了体现出城市的地区差异,我们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的划分方法,将城市归到所属省份的八大区域中。分别是:南部沿海(粤、闽、琼)、东部沿海(沪、苏、浙)、北部沿海(京、津、冀、鲁)、东北(辽、吉、黑)、长江中游(皖、赣、鄂、湘)、黄河中游(晋、内蒙古、豫、陕)、西南(桂、渝、川、云、黔)、西北(藏、甘、青、宁、新),由于具体城市名单太多,在此不予列出,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表4是市辖区和市辖县两个子样本的检验结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前期的居民福利水平对当期值具有显著影响,且表现出正相关。这表明无论是市辖区还是市辖县,居民前期的福利水平对后期福利水平都具有促进作用。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它对市辖区居民的福利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市辖县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具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其中原因可以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分析。从数量看,FDI流入投资地后,绝大多数在市辖区“扎堆”,它作为多种生产要素的复合体,其外溢效应对辖区内居民经济福利水平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由于流向市辖县的外资数量很少,其难以形成外溢效应,对当地居民难以产生正向作用。从质量看,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外资大多流向市辖区,而能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的外资流向市辖县,流入市辖区的外资与当地形成了良好的协同效应,对辖区的技术水平、制度环境等产生了积极效应,从而在整体上促进了居民经济福利的提升;流入市辖县的外资,其较少参与到当地经济发展中,所从事的行业往往对当地经济产生显著的负效应(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从而对居民经济福利水平形成了负向影响。

对于政府优惠政策,它在市辖区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市辖县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我们认为其中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分权”与“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后者出于表面化、短期化的政绩目标,在经济发展理念中表现出明显的“重城市、轻农村”倾向。不仅大量优质资源向城市集聚,而且农村产生的经济成果也被政府之手挪用到城市的发展中去,从而产生了政策在两个地区的显著差异性,最终导致了市辖区、市辖县两个区域居民福利水平的差异化发展。

从交互项( $\ln(FDI) \times POLI$ )的结果看,它与前面单一变量在两个地区的结论类似,即市辖区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市辖县的系数显著为负。我们认为,由于流入两个区域的外资存在显著的“质”与“量”的差异,而政府在发展理念与资源配置上也存在明显的城乡偏好,从而外资与政策的综合作用在前者形成了积极的正效应,而在后者则形成了显著的负效应。正因如此,市辖区的居民受惠于二者的积极效应,福利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市辖县的居民不仅没有从中受惠,反而还分摊了外资项目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及城市建设成本,加剧了福利水平的恶化,从而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

表5是市辖区的检验结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市辖区居民经济福利变量的滞后一期对当期都具有正向影响,并且大多数区域都表现出显著性。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发现FDI进入中国后,它对八个地区城市居民经济福利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八个区域中,FDI的符号都为正,并且大多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FDI进入提高了市区居民的经济福利。FDI进入各城市后,大多数流入到工业行业中,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并行发展的,FDI进入工业行业后直接提高了行业活力及生产效率,进而增加

表4 市辖区与市辖县的检验

	市辖区	市辖县
$\ln(WI_{it-1})$	0.108** (2.42)	0.136*** (3.13)
$\ln(FDI)$	0.137** (2.51)	-0.298 (-1.06)
$POLI$	0.225*** (3.66)	-0.194* (-1.82)
$\ln(FDI) \times POLI$	0.161*** (3.47)	-0.116** (-2.25)
$\ln(DELE)$	0.201*** (2.97)	0.235*** (3.14)
$OPEN$	0.279** (2.18)	0.296 (1.40)
$EDUC$	0.305 (0.99)	0.288** (2.41)
$CONS$	3.505*** (3.62)	3.712*** (3.27)
调整后的 $R^2$	0.68	0.60
Wald 统计量	45.66	43.92
Sargan 统计量	28.57 [0.39]	29.45 [0.42]

注: \*、\*\*、\*\*\* 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水平上的显著性,小括号中数值为  $t$  值,中括号中的数值表示 Sargan 检验接受原假设的概率  $P$  值;Wald 统计量中,如果其值大于 10,则表明模型的整体回归显著有效。

了企业产出与职工收入;间接的,企业收入增加必将带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收入,政府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思路,促使其不断改善和提高城市的基础建设和配套服务,进而提供给市区居民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FDI进入各区域后,倾向于在城区“扎堆”,特别是从事第三产业的FDI,它们在城市的经营活​​动直接提高了市区居民的就业和生活水平;它对当地政府产生的“潜移默化”影响也将推进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促进当地制度环境的改善,产生明显的制度变迁效应。因此,FDI带给城市居民经济福利的改善,不仅有收入上的提高,还有生活质量、生活内容等方面的提高和丰富,FDI对当地产生的各项溢出效应,将使市区居民享受到经济、制度、法律、服务等多方面的正外部性。

对于优惠政策指数,它在多数省城市区的符号为正,只有黄河中游和西北两个地区的符号为负。这说明,政府通过在辖区内设立开发区、免税区(港)、开放口岸等,在大多数区域都促进了市区居民经济福利的提高。地方政府通过各类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FDI流入,并让其参与到辖区经济活动中来,FDI具备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将会对本地企业产生溢出效应,虽然FDI流入可能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但在大多数区域,它产生的正向效应明显超过了负面影响。同时,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不断调整本辖区的引资政策,对不同类别的FDI给予区别对待,提高了FDI与地区资源的匹配性,实现了外资企业与地方经济的协同发展,市区居民作为地方经济的实现主体,也将分享到此类优惠政策产生的经济效应。黄河中游和西北两个地区的符号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二者在总体上缺乏引资优势,或者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没有实现与流入FDI的匹配。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国的能源集聚地,FDI流入更多地进入资源密集型、环境污染型行业,虽然FDI的流入可能带来了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外资企业利用“超国民待遇”资格将生产成本进行了社会化分摊,或是这些城市大多具有资源型城市特征,其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资源的深加工,地区经济出现了“资源性依赖”而难以升级,因此随着资源的枯竭,城市发展动力不足,产生了明显的“荷兰病”。西北地区既可能存在城市对资源依赖的特征,同时也可能是进入这些地区城市的FDI数额较少,对居民经济福利难以产生明显影响,而优惠政策中存在较大的先期投入,形成的成本因没有带来FDI的大量流入而不能收回,从而出现了民众为政府政策买单的恶果,最终导致了居民经济福利的下降。

从交互项( $\ln(FDI) \times POLI$ )的结果看,八个地区中,只有黄河中游和西北两个地区的符号为负,其他六个地区的结果大多显著为正。表明FDI与优惠政策结合后,产生的效益明显提高了当地市区居民的经济福利。在大多数城区,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已经与流入的FDI形成了融合,优惠政策减少了外商投资的生产成本,进而产生的外溢效应对当地经济和居民收入、生活质量等产生了促进作用,从而表现出居民经济福利的增加。对于符号为负的两个地区,可能原因是这些地区的资源禀赋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发展,地区经济与居民收入形成了对资源的依赖,优惠政策可能加剧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流入FDI多从事能源密集型、环境污染型生产,地区经济产生了“路径锁定”,居民福利将随着城市资源的枯竭而趋于下降。

表6是市辖县的检验结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市辖县居民经济福利变量的滞后一期对当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大多数地区的系数为正,而东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及西北地区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我们发现它流入各个地区后,与市区的回归结果比较,它对县区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三个沿海区域中,北部沿海地区的符号为负,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余两个地区的符号与市区回归结果一致,符号为正;五个内陆地区中,只有长江中游和西北地区的符号为正,其他三个区域的符号都为负。这说明,无论在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FDI流入产生的正向溢出并没有实现辖区居民的共同分享,相反,它对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县区居民经济福利产生了恶化作用。其中的原因是北部沿海虽然也是FDI先期流入的区域,但它们本身的逐利动机、政策导向、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城乡均衡性等导致了FDI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显著的区际、区内差异。技术导向、市场导向的外资大多向市区集聚,能源密集型、环境污染型FDI多数流入城市县区,它们虽然对县区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可能加剧了当地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并且由于地方政府对FDI的偏好,使得外商在生产过程中时常将成本进行社会化分摊,从而在总体上恶化了县区居民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同时,由于北部沿海不仅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不一致,而且也存在行政层级上的差异<sup>[24]</sup>,这也可能是导致其与另外两个沿海地区结果不一致的

原因。基于此,我们不考虑归属于河北省的样本,再次进行回归,得到系数为 0.126,并且其在 0.05 水平上显著,从而我们的假设得到证实。在三个符号为负的内陆地区,其中的原因与北部沿海地区存在共性,流入这些城市县区的 FDI 更多的是在母国处于边际产业的企业,它们流入中国表现出强烈的要素寻求导向。同时,长期以来,锦标赛背景下地方政府缺乏发展县区经济的动力,常将县区内的优质资源用来发展市区经济,但县区居民却承担着市区经济发展过程的成本分摊,FDI 的产出也常被政府之手用来发展市区经济,从而导致了县区居民经济福利的下降。

表 5 基于市辖区数据的分地区检验

	南部 沿海	东部 沿海	北部 沿海	东北 地区	长江 中游	黄河 中游	西南 地区	西北 地区
$\ln(WI_{it-1})$	0.130 *** (2.87)	0.128 *** (3.03)	0.109 ** (2.21)	0.072 (0.99)	0.204 *** (3.15)	0.110 (1.08)	0.217 *** (2.95)	0.113 (1.09)
$\ln(FDI)$	0.232 *** (2.91)	0.185 *** (3.01)	0.179 *** (3.27)	0.202 ** (2.15)	0.177 ** (2.26)	0.146 * (1.89)	0.201 *** (3.44)	0.166 (1.57)
<i>POLI</i>	0.226 ** (2.35)	0.192 *** (3.55)	0.219 ** (2.37)	0.160 ** (2.33)	0.192 ** (2.09)	-0.149 ** (-2.22)	0.166 ** (2.20)	-0.201 * (-1.97)
$\ln(FDI) \times$ <i>POLI</i>	0.148 ** (2.74)	0.133 ** (2.51)	0.176 ** (2.30)	0.212 (1.53)	0.160 (0.95)	-0.141 *** (-2.92)	0.201 ** (2.44)	-0.139 *** (-3.07)
$\ln(DELE)$	0.215 ** (2.74)	0.250 *** (2.96)	0.222 *** (3.09)	0.194 *** (2.88)	0.203 * (1.91)	0.197 ** (2.63)	0.202 ** (2.32)	0.211 ** (2.51)
<i>OPEN</i>	0.267 ** (2.47)	0.197 ** (2.40)	0.215 ** (2.19)	0.205 ** (2.22)	0.131 ** (2.61)	0.208 ** (2.34)	0.166 ** (2.40)	0.214 * (1.89)
<i>EDUC</i>	0.102 *** (2.87)	0.114 *** (2.98)	0.190 ** (2.26)	0.023 ** (2.14)	0.129 ** (2.01)	0.115 ** (2.14)	0.193 ** (2.36)	0.142 ** (2.33)
<i>CONS</i>	3.092 ** (2.11)	2.943 ** (2.57)	3.107 ** (2.21)	3.008 ** (2.30)	3.139 ** (2.07)	2.991 ** (2.18)	3.024 ** (2.44)	3.296 ** (2.27)
调整后的 $R^2$	0.58	0.53	0.54	0.58	0.57	0.56	0.51	0.53
<i>Wald</i> 统计量	41.23	37.88	39.58	38.86	40.09	42.35	41.44	40.21
<i>Sargan</i> 统计量	27.05 [0.37]	28.42 [0.31]	29.21 [0.39]	29.53 [0.36]	28.40 [0.33]	27.16 [0.37]	29.04 [0.40]	28.94 [0.39]

注: \*、\*\*、\*\*\* 表示 0.1、0.05、0.01 水平上的显著性,小括号中数值为  $t$  值,中括号中的数值表示 Sargan 检验接受原假设的概率  $P$  值; *Wald* 统计量中,如果其值大于 10,则表明模型的整体回归显著有效。

表 6 中,优惠政策指数的符号在三个沿海地区为正,在五个内陆地区都为负,表现出明显的“沿海—内陆”二元性特征。对于上述结果,我们的理解是,政策作为地方政府调控辖区经济的手段,它本身难以产生市区与县区上的空间差异,该因素所导致的市区与县区居民经济福利差异更可能的原因来自于政府之手对经济成果的不合理分配。对于沿海城市,其城乡间虽然存在差距,但城乡居民收入的整体水平较高,加之沿海地区开放程度高,县区居民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收入可能掩盖了政府之手对经济成果在市区及县区间的不合理分配。然而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度较低,个体禀赋差异已经造成了居民收入的市县区的不同,但在地方政府重点发展市区经济进而实现短期化表面化政绩理念的驱使下,政府之手常将县区资源和成果转移到市区发展上去,县区居民不仅没有分享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果,相反还成为市区发展的买单人,因此,在内陆地区,影响县区居民经济福利下降的诸要素中,政府行为是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

从表6交互项( $\ln(FDI) \times POLI$ )的结果看,除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两个地区的符号为正外,其他六个地区的符号都为负。对于内陆地区,产生上述结论是不难理解的,FDI在市县区的不平衡和异质性分布及其生产成本的社会化分摊,已经降低了区域居民的福利水平,而地方政府对市区与县区差异化的发展理念,促使其利用政策引资得来的成果转移到市区发展中,二者强化了区域内资源与成果的不合理分配,加剧了县区居民经济福利的恶化。对于北部沿海地区,其符号也为负,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该地区与其他两个沿海地区相比,地区内部在行政层级、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远大于后者,因资源在区际间的分配不均、优惠政策在区际间的明显差距,加剧了区际的市县区居民福利,同时在区内也存在更加明显的城乡福利差异。对此,我们将该区域内的河北省诸城市的样本剔除后检验,发现符号已经变为正,但不显著,当将山东和河北两个省域样本剔除后再次检验,发现结果显著为正,这表明我们推论的合理性。

表6 基于市辖区数据的地地区检验

	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北部沿海	东北地区	长江中游	黄河中游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ln(WI_{it-1})$	0.212** (2.17)	0.198*** (3.04)	0.170** (2.31)	-0.208 (-1.21)	0.186 (1.44)	-0.194 (-1.25)	0.201 (0.99)	-0.180 (-0.86)
$\ln(FDI)$	0.131** (2.22)	0.146** (2.40)	-0.149** (-2.64)	-0.155** (-2.07)	0.137* (1.86)	-0.166** (-2.39)	-0.139** (-2.01)	-0.171** (-2.74)
$POLI$	0.165** (2.46)	0.183*** (2.97)	0.105** (2.33)	-0.121*** (-3.04)	-0.159** (-2.22)	-0.148** (-2.17)	-0.155** (-2.39)	-0.130** (-2.19)
$\ln(FDI) \times POLI$	0.101** (2.14)	0.195** (2.20)	-0.124** (-2.29)	-0.131** (-2.20)	-0.104** (-2.31)	-0.150** (-2.19)	-0.117** (-2.33)	-0.122 (-0.87)
$\ln(DELE)$	0.218** (2.65)	0.209** (2.24)	0.201** (2.06)	0.193** (2.44)	0.107** (2.31)	0.192** (2.23)	0.236** (2.41)	0.189** (2.51)
$OPEN$	0.197** (2.11)	0.207** (2.25)	0.179** (2.30)	0.166** (2.39)	0.123** (2.02)	0.184** (2.14)	0.213** (2.30)	0.154** (2.27)
$EDUC$	0.101** (2.46)	0.108 (1.18)	0.121** (2.22)	0.145** (2.43)	0.198*** (3.55)	0.174** (2.74)	0.151** (2.15)	0.191 (1.42)
常数项	5.081** (2.15)	4.520** (2.28)	4.907** (2.39)	5.034** (2.21)	7.086* (1.73)	5.401** (2.44)	4.934** (2.48)	5.115** (2.02)
调整后的 $R^2$	0.48	0.47	0.48	0.45	0.50	0.48	0.51	0.44
Wald 统计量	43.42	47.13	46.45	40.35	44.19	45.33	41.82	42.73
Sargan 统计量	28.62 [0.31]	29.04 [0.32]	28.54 [0.31]	28.77 [0.35]	27.89 [0.30]	28.58 [0.34]	28.71 [0.33]	29.12 [0.31]

注: \*、\*\*、\*\*\*表示0.1、0.05、0.01水平上的显著性,小括号中数值为Z值,W表示Wald检验,该值大于10时,则表明模型的整体回归显著有效。

##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借鉴Changkyu Choi<sup>[17]</sup>,魏后凯<sup>[15]</sup>的研究方法,利用中国210个地市及以上城市1994-2013年数据,通过建立动态计量回归方程,先从市辖区和市辖县两个方面地方政府引资竞争背景下FDI对城乡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然后按照一定标准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八个区域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无论是市辖区,还是市辖县,地方政府引资竞争背景下FDI对辖区居民的经济福利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对于市辖区居民,FDI进入显著提高了他们的经济福利水平,地方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对居民

经济福利也具有间接的积极作用;而对于市辖区居民,FDI 进入对其经济福利的积极影响并不明显,相反,在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发展理念下,政府之手扭曲了资源在城乡的合理流动与分配,市区经济发展成本存在向县区居民分摊的事实,同时,优惠政策并未对居民经济福利产生积极影响,反而具有恶化居民福利水平的趋势。同时,无论是市辖区,还是市辖区,引资竞争背景下 FDI 对区内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都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

上述结论对于我们深入考察和进一步有效利用 FDI 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分权”和“政治晋升”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为实现表面化、短期化的政绩目标,竞相将 FDI 作为推动辖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通过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从而展开了疯狂而盲目的引资竞争。在此背景下,FDI 大量流入,它虽然在总体上促进了辖区经济的发展,但同时,FDI 在城乡间的不平衡分布加剧了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影响了中国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在接下来的外资引进和利用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当既要充分利用辖区比较优势,吸引符合辖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外资项目来推动辖区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效率提升,并最终增强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sup>[25]</sup>;同时,地方政府在发展辖区经济的过程中,需要合理处理城乡统筹发展,摒弃“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理念,实现资源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与分配,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不断优化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以实现全体居民福利的共同提升。

#### 参考文献:

- [1] BLOMSTRÖM M, LIPSCY R, ZEJAN M. What explains the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 NBER Discussion Paper, No. 1924, 1994.
- [2] BORENSZTEIN E, DE GREGORIO J, LEE J 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45 (1): 115-135.
- [3] REIS A B. On the welfare effe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54 (2): 411-428.
- [4] MARKUSON J R, MASKUS K E. Multinational forms: Reconciling theory and evidence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7163, 1999.
- [5] MORAN T 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w-income poorly performing states [M]. Washington: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2005.
- [6] SARBAJIT C, DIBYENDU B. FDI in agricultural land, welfare and unemployment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J]. Research in Economics, 2010, 25: 229-239.
- [7] 潘文卿. 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J]. 世界经济, 2003 (6): 3-7.
- [8] 于津平. 外资政策、国民利益与经济发展 [J]. 经济研究, 2004 (5): 49-57.
- [9] 应千伟, 杨全发. 吸引 FDI 对东道国福利的影响 [J]. 世界经济文汇, 2004 (5): 36-46.
- [10] 周泳宏. 漏损、FDI 外溢效应弹性和东道国福利 [J]. 世界经济研究, 2008, (6): 63-68, 88.
- [11] 张广胜, 周娟. FDI 对城乡收入不均等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 GMM 分析 [J]. 财经科学, 2009 (2): 88-91.
- [12] 颜冬. 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 FDI 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J]. 技术经济, 2015, 34 (3): 58-62, 96.
- [13] 阚大学.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经济福利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 [J]. 石河子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24 (2): 56-59.
- [14] 郑少华, 罗丽英. 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福利水平影响实证研究 [J]. 湖南社会科学, 2013 (3): 148-151.
- [15] 魏后凯.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J]. 经济研究, 2002 (4): 19-26.
- [16] 陶然, 刘明兴.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地方政府开支及财政自主 [J]. 世界经济文汇, 2007 (2): 1-21.
- [17] CHOI C.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come convergence [J]. Applied Economics, 2004, 36 (10): 1045-1049.
- [18] SEN A. Real national income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6, 43: 19-39.
- [19] 莫亚琳, 张志超. 城市化进程、公共财政支出与社会收入分配——基于城乡二元结构模型与面板数据计量的分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1 (3): 79-89.

- [20]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R].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012.
- [21] DÉMURGER S, SACHS J D, WOO W T, et al. Geography, economic polic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Asian Economic Papers*, 2002, 1 (1): 146-197.
- [22] 陈刚. FDI 竞争、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对中国式分权的反思[J]. *世界经济研究*, 2009, (6): 3-7, 43, 87.
- [23] 赵奇伟. 东道国制度安排、市场分割与 FDI 溢出效应: 来自中国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09, 8(3): 891-924.
- [24] 魏玮, 宋一弘, 刘志红. 能源约束、环境规制对 FDI 流动的经济效应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3(2): 106-112.
- [25] 曾国平, 彭艳, 曹跃群. 产业结构调整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实证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1(6): 77-85.

##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FDI and welfar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ANG Qinghua<sup>1</sup>, WANG Ruijun<sup>2</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P. R.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P. R.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t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for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FDI on economic welfa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cities, this paper ha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economic welfar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etition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from two aspects of the municipal district and the outskirts of city.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ing: in the municipal district, FDI has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welfare of residents,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are indirectly good for improving economic welfare of residents. In the outskirts of city, FDI has not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welfare of residents,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don't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it.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eavy city, light country"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residents in the outskirts of city have assessed the cost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hare weakened welfare level of them.

**Key words:** competition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FDI; residents welfare; local governments

(责任编辑 傅旭东)